

· 版本研究 ·

从经疏合抄到经注疏合编： 成玄英《庄子疏》文本生成与演变蠡测*

谢 明

内容摘要：对比成玄英《庄子疏》中郭注、成疏的内容可知，成疏既有不少条目因袭郭注，也有驳证郭注或另立新说的情况；二者关系疏离，可证《庄子疏》原本并非经注疏合编。结合唐代前后义疏形制、成疏性质及体例、史料记载、出土文献实物等多方面证据可知，成疏早初文本为经疏合抄。宋初所存经疏合抄本虽经官方校勘，编入《道藏》，具有一定权威性，但并非今存一众经注疏合编本的底本来源。异文显示，经注疏合刻本、合抄本等成疏今本都是以宋代国子监经注本组配疏文重构而来。以日本高山寺本等早期抄本逆推疏文所据之经文与今本存在较大差异，今本经疏文字之间亦时有不相匹配者，说明从唐五代早初的经疏合抄本到宋代及以后的经注疏合编本，成疏经文因组配重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复原本之貌。

关键词：成玄英《庄子疏》 经疏合编 宋代监本

引言

成玄英《庄子疏》是继郭象《庄子注》之后又一部注解《庄子》的经典之作，关于其版本系统学界已有研究^①。关于其早初^②文本形式，学界也大致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成疏早初文本即为经注疏合编^③，如王叔

* 本文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国图藏敦煌道教文献综合研究”（2026N013）及宁波大学高级别人文社会科学培育项目“《庄子》经注疏版本异文汇校考释”（XPYQ23001）阶段性成果。

① 详参丰子翔：《〈庄子注疏〉传本考述》，《文献》2023年第5期，第77—96页。

② 本文所谓“早初”即最初和早期。最初指成疏成书时，早期指唐五代的抄本时期。

③ 本文所谓“经注疏合编（本）”包括经注疏合抄（本）和经注疏合刻（本）。

岷认为日本高山寺所藏旧抄卷子本《庄子》(以下简称“高山寺本”)来源甚早,出于南朝刘宋元嘉本;后又认为该抄本(底本)为成疏本^①,乃节略疏文,只抄经注而成,虽“失成疏本之旧”,然“去成疏原本未远”^②;韩世芳认为:“隋唐之后,最为通行的就是郭象注本,至唐初,西华法师成玄英撰《南华真经注疏》,也是依郭象注本再作疏解,使得成疏与郭注结为一体。”^③另一种意见以儒家经典义疏长期以单疏形式流传,直到南宋才出现注疏合刻本的情况为类比,认为既然成疏是为疏解《庄子》及郭象注而作,应该也是长期以单疏形式流传,至南宋形成注疏合刻,如马鸿雁认为:“北宋仁宗时,《庄子》和《老子》、《列子》等仍是经、疏分刻,《庄子》注疏合刻本也和诸经注疏本一样出现在南宋。”^④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南宋刻本《庄子注疏》似可为这种观点提供证据。

在前一种看法中,成疏是一种形式完善的理想文本,一如今本形制,经、注、疏俱在,利用方便;而后一种看法有儒家经典义疏为参照,似更具学理。但两种意见均未被证实。由两种意见推衍而去,又会引发围绕成疏本之形成、演变的其他问题,如:成疏等名为“疏(义疏)”的著作在(长期)以单疏形式流传之外,是否也以其他形式流传过^⑤?在经、注、疏三者合编重构的历史过程中,一般认为先形成经注,再拼合疏文,有无其他组配形式?成疏今本经文、注文和疏文是什么关系?成疏今本如何形成?

^①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成玄英之书称为“成疏本”;需要区分时,原本称为“成疏原本”,今本称为“成疏今本”;其疏文简称“成疏”或径称“疏文”。

^②详参王叔岷:《跋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残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第161—163页;《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诸子斟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563页。

^③韩世芳:《李善〈文选注〉引〈庄子〉及向秀、司马彪、郭象〈庄子注〉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高华平指导),2015年,第10页。

^④马鸿雁:《郭象〈庄子注〉版本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韩格平指导),2012年,第150页。按,其他学者亦有类似观点。详参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中华书局,2019年,第274页;丰子翔:《〈庄子注疏〉传本考述》,《文献》2023年第5期,第77页。

^⑤已有学者注意到类似问题,如顾永新说:“我们认为,并不能完全排除八行本之前存在注疏合刻本的可能性,在北宋或南宋早期,可能有诸如《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论语注疏解经》十卷本这样的注疏合刻本的存在。”(顾永新:《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页注2。该书第165页有更详细的论述。)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成疏今本皆为经注疏合编本,有如下几种: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残卷(番号:8473,存卷一、卷七至卷十,以下简称“静嘉堂本”);明《道藏》本;以明《道藏》本为底本刊刻的《道藏辑要》(以下简称“《辑要》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室町时期(1336—1573)旧抄本(番号:7402,以下简称“宫内厅本”);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室町时期旧抄本残卷(番号:509,存《逍遥游》至《德充符》、《天地》、《山木》至《天下》,以下简称“足利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室町时期旧抄本(番号:110X,以下简称“庆应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万治四年(1661)刻本(番号:2074,以下简称“万治本”)①。本文将以这些今本(《庄子注疏》)为线索,上溯其源(《庄子疏》),并追寻成疏原本的文本形式,丰富有关唐五代时期义疏类著作流传形态的认知。

一、成疏原本形式的推定

儒家经典义疏有单疏本、经注疏合编本两种形式。以此类比,成疏原本的形态似乎也只能是单疏本或经注疏合编本。但这种看法存在逻辑漏洞:除去单疏的形式外,疏与经、注组配,理论上可以形成经疏、注疏②、经注疏三种形式。因郭注自成书以来即附经而行,节略经文只合编注疏似不合乎正常做法,亦未见实物及相关记载,故可不论。因此,成疏原本的形态应存在单疏、经疏合编③和经注疏合编三种可能。

(一)成疏原本不是经注疏合编

名为“疏(义疏)”的儒家经典著作最早并非经注疏合编已渐为人共知。成疏是否同样如此?可借助疏文,从内部寻找证据。

对比成疏与郭注可发现,二者有大量条目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其

①上述几种残本多有补配,这些补配篇目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另外,《古逸丛书》以静嘉堂本为底本,缺佚部分以日本坊刻本和《道藏》本补配,因是拼配而成,不纳入本文的讨论。

②经学研究者多将经注疏合编本简称为注疏本。为严格分类,本文所称“注疏本”不包括经文。

③经疏合编这种组配形式,经学研究者或许考虑过,只是没有直接证据存在,故而在研究中一般不会提及。

中字词训释相同者^①,共 70 条。包括内篇 22 条(《齐物论》10 条、《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各 3 条、《养生主》2 条、《应帝王》1 条),外篇 15 条(《天地》《秋水》各 3 条、《天道》《田子方》《知北游》各 2 条、《胠篋》《在宥》《山木》各 1 条),杂篇 33 条(《徐无鬼》7 条、《列御寇》6 条、《寓言》5 条、《庚桑楚》《则阳》《天下》各 4 条、《外物》3 条)。也有串讲大意相同者^②,共 14 条。其中内篇 2 条(《齐物论》《人间世》各 1 条),外篇 9 条(《山木》5 条、《在宥》2 条、《田子方》《知北游》各 1 条),杂篇 3 条(《徐无鬼》《外物》《寓言》各 1 条)。仅这两类,注文、疏文相同的条目就多达 84 条,这说明:1. 郭注不是偶然麇入成疏,而是成疏有直接因袭郭注的体例;2. 成疏原本并非经注疏合编,否则成疏有如此多的条目直接因袭郭注,是不必要的重复和冗余。

(二)成疏早初文本为经疏合编

“疏”本疏通之义,其主要目的(重心)是解经,即疏通正文,而不必然包含解注的意义,这一点已有学者予以揭示。如龚鹏程说:“义疏是配合讲论风气而形成的另一种注解,它本身是独立的,并不依傍注文。所以成玄英以前的庄子疏,也只是直接疏释原文,并不倚据谁的注。”^③此类著作也不必然以单疏流传,可以和经文组配成经疏本。结合唐代前后义疏类著作的形制、成疏性质及体例、史料记载、出土文献实物等内外几方面的证据可以证明,成疏本早期就形成了经疏合抄,甚至有可能最初就是一个经疏合抄本。兹论述如下。

1. 义疏并非只能以单疏形式流传,唐代前后经疏合编并不鲜见

敦煌遗书中,如 P. 2517 为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卷五,经文大字,

^①如《齐物论》“彼是莫得其偶”,郭注作“偶,对也”,成疏亦作“偶,对也”;“适得而几矣”,郭注作“几,尽也”,成疏亦作“几,尽也”(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 年,第 35、38 页)。

^②如《人间世》“就不欲入”,郭注作“就者形顺,入者遂与同”,成疏作“郭注云:就者形顺,入者遂与同也”;《外物》“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郭注作“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成疏作“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也”(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第 90、532 页)。

^③龚鹏程:《成玄英〈庄子疏〉探论》,《鹅湖月刊》第 17 卷(1991 年)第 1 期,第 18 页。

疏文双行小字,皆墨书,可见此书早初形式就是经疏合编^①;S. 6044 + BD14677 为不见著录的某家《老子道德经义疏》,经文朱书,注文墨书,亦是经疏合编^②。更有说服力的是《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此书本为疏解《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注》而作,敦煌存有数种抄本(P. 3592、P. 2823、S. 4365),皆为经疏合编,经文朱书,疏文墨书,可见此书早初形式就是经疏合编(《道藏》亦有收入,为经疏合刻)。

敦煌本中,如此多的道家著作存在经疏合编本,与儒家著作的情况^③形成反差;之所以如此,乃儒道两家地位和义疏情况不同所致。儒家经典义疏之所以以单疏形式流传,一是因为其本经体量庞大,又常以套书形式流布,在抄本时代传抄很不容易^④;二是儒家经典对于读书人而言多有记诵,不配经文也不太影响对疏文的理解。与之相对,像成疏这样的道家经典义疏体量相对要小,使用者对经文的熟悉程度可能也不像儒家经典那样高^⑤,故成疏配经文而行的需求相对更迫切。

2. 成疏实为集解性质的新注,与儒家经典义疏名同而实异

关于成疏的性质及其与郭注的关系,学者早有阐发,如王重民认为成疏不为郭注而作^⑥。杜文君发现,成疏有不疏解郭注之处,有驳正郭注之

①此卷在疏释时,每章之下及各节之前有一些总括性的文字,作大字书写。有学者视为“注文”(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按,这些文字并非解字疏句型,而是总括提要型,且没有疏释疏文的内容,全为经文而作,故其本质仍是“疏”,并非“经注疏”之“注”。

②详参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第175页。

③儒家经典有类似形式,如敦煌P. 3573为皇侃《论语疏》抄本,其形式为经文大字单行,注文小字双行,只录首句或其中部分文字,接以“云云”而省略其他注文,之后再接疏文(详参张涌泉主编、审订:《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1828—1829页)。该抄本更近于一种经疏组配、节略注释的特殊经疏合编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五代义疏类著作也可以经疏合编的形式存在。

④《宋史·邢昺传》载邢昺说:“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98页)

⑤尽管《庄子》作为道教经典在唐代地位较高(唐代道教被立为国教),且被列入道举科,可以参加明经考试,但在读书人群体中的影响仍不及儒家经典。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朝廷无暇顾及,其地位更是进一步下降。有学者发现,《新唐书》中“《艺文志》所录的注《庄子》者,大多是唐玄宗及其以前的人……唐代后期几乎没有像样的庄学了”(熊铁基等:《中国庄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7页)。

⑥王重民:《冷庐文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14页。

处,有质疑郭注而另立新说之处,有不置可否而作新解之处,在疏解过程中又大量吸收《经典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及众家《庄子》注之解释,实际是一部“集释”之书^①。王、杜二家之说可从^②。成疏实是在因袭、驳正、补充、忽略郭注基础上,吸取众家解释形成的新注,其主要目的是疏解《庄子》,而非郭注,因此也不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③。成疏性质既与儒家经典义疏不同,二者在组配形式上也不能作同类比勘,据后者以推前者。作为一种新注,成疏有可能如郭注及《释文》所收崔譔等诸家注本一样,配经文而行。

成疏实为“成注”。历史上有些典籍既可名注,又可名疏(义疏),二者相混不别^④。这也能解释《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成玄英)注《庄子》三十卷、《疏》十二卷”^⑤。成疏序言称“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辄为疏解,总三十卷”^⑥,故《新唐书》所载三十卷注本殆即三十卷的成疏。而根据《旧唐书·经籍志》及其他现存材料记载^⑦,成氏在《庄子疏》之外并无另一种《庄子注》存在。欧阳修等人或是在修撰《新唐书》时,见到前人(时人)

①杜文君:《郭象〈庄子注〉与成玄英〈庄子疏〉关系论》,《励耘语言学刊》2022年第2辑,中华书局,2023年,第291—302页。

②除了王、杜二家之外,其他学者亦有相关阐发。详参蒙文通:《辑校成玄英〈道德经义疏〉》,《蒙文通全集》第5册,巴蜀书社,2015年,第109页;龚鹏程:《成玄英〈庄子疏〉探论》,《鹅湖月刊》第17卷(1991年)第1期,第18页。

③这种学术风尚渊源有自,如孙诒让说:“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义疏家则不尽然。”(孙诒让:《周礼正义略例》,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2页)

④如南朝顾欢《道德经注》,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分别名为《老子义疏》《老子道德经义疏》《道德经义疏》(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三四,中华书局,1973年,第1001页。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2028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九,中华书局,1975年,第1515页),《道藏》本又题为《道德真经注疏》。敦煌遗书S.4430即为此书,经注连书,字体大小不别(详参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第172—173页)。

⑤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九,第1517页。

⑥成玄英:《庄子序》,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第9页。按,“三十篇”当依《道藏》本、宫内厅本、足利本等作“三十三篇”。

⑦诸家著录情况详见足利本书末市野光彦所牒列古今各书目之记载,其中郑樵《通志·艺文略》亦载成注三十卷本《庄子》,当是采摭《新唐书·艺文志》而来。

所编而今亡佚的书目等材料中有成注《庄子》三十卷,故编入《艺文志》中而与十二卷的版本拈合在一起^①,致人误以为是成玄英的另一注本。

3. 成疏不标起止,非单疏、注疏之体,指向经疏合编

为明确疏解之对象,单疏标示起止乃是通例,儒家经典注疏一般也标示起止^②;而成疏今本皆不标起止。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成疏原本就是经疏合编,且为集解性质的新注本,不需要标示起止;二是成疏原本也标示起止,在后来的流传过程或注疏合编时被删除^③。第二种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是因为:一者从郭注与成疏关系来看,郭注很多条日本就很难或无法标起止,如成疏因袭郭注者、不疏解郭注者、对郭注不置可否而作新解者。二者成疏绝大部分条目没有区分经文、注文的疏解层次,无法像儒家经典义疏般可以先标起止注经文,再标起止疏注文。三者现存诸本成疏来源、性质不尽相同,既有刻本,又有抄本;既有中土的,又有异域的。其版本系统不一、文字内容有异,不大可能同时删除起止而全无差异。所以综合来看,成疏当本就不标起止,指向其编纂方式是经疏合编。关于后两点,上文提及的《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可作一例。该书同样名为疏,但并不标起止,亦不一一疏解《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注》之注文,而是在串讲中以涉及原注为主,形成一种不唯注文、与注之关系相对疏离的新著,故其文本形式为经疏合编。

4. 北宋初期曾流传有经疏合抄本,其底本(祖本)当为唐五代抄本

北宋道士陈景元曾作《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又校所见《庄子》抄本而成《庄子阙误》。《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叙》曰:“复将中太一宫《宝文统录》内有《庄子》数本及笈中手钞诸家同异,校得国子监景德四年印本不同,

①崔珍哲已经注意到两《唐书》记录的参差,并解释说:“这可能是《新唐书》标榜‘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以导致有史实不清之处,而且所录文书奏章也任意删改,以致发生了这种谬误。”(崔珍哲:《成玄英〈庄子疏〉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第11页)按,欧阳修等人也可能怀疑过二书当为一种,只是因见不到而无法证实,故采入书中以广异闻。

②既有经注皆标起止者,也有只标注,不标经者(详参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248页)。

③如越刊八行本《周易注疏》在注疏合刻时会删去经传出文(详参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57页注3)。

共三百四十九字。”^①这些版本分别是“景德四年国子监本；江南古藏本，徐铉、葛湍校；天台山方瀛宫藏本，徐灵府校；成玄英解疏^②，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文如海正义，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散人刘得一注（大中祥符时人）；江南李氏书库本；张潜夫补注”^③。其中“成玄英解疏，中太一宫本，张君房校”即成疏本，“解疏”就是疏解，义同于“疏”，为宋人用语。而“成玄英解疏”，南宋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引作“成玄英疏”^④，亦可证。陈景元所校“诸家同异”是对校经文，既如此，则其所见张君房校成疏本为经疏合抄^⑤。

北宋开国后，太宗曾下令搜访道书，命徐铉等人校正抄写；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诏修《道藏》，令王钦若总领其事，成藏后其经目名为《宝文统录》。因编次参差，所校不精，真宗不甚满意，遂于大中祥符五年令著作佐郎张君房继领其事。张君房商较异同，铉次成藏，于天禧三年（1019）进献于上，题曰《大宋天宫宝藏》。所谓“中太一宫本”当即张君房所校《道藏》本。该本无论是原徐铉所校之本，还是后来搜访、征集而来，从时间上看，都不会太晚，在宋初前已经形成，其底本（祖本）当为唐五代抄本。

5. 出土文献可为经疏合抄本的早初流传提供另一证据

吐鲁番出土有成疏残片 Ch773v（原编号：TⅢ1510）^⑥，乃经疏合抄，存 9 行，经、疏字号相同，中间空两格以示区别。关于此残片的抄写年代，诸家未做判断；而其底本（祖本）的形成，很可能在唐五代时期，至少不晚于北宋初期^⑦。理由如下：

①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叙》，《道藏》第 15 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894 页。

②玄，原作“元”，乃避讳改字，今改回其本字。下同，不另注。

③陈景元：《南华真经余事杂录》卷上，《道藏》第 15 册，第 959 页。

④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序》，《道藏》第 15 册，第 176 页。

⑤该本不会是经注疏合抄，一则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所引可证该书为成玄英《庄子疏》；二则陈景元所引每种版本都尽可能详细注明作者（注者）、藏地、校者，甚至年代，若此书为注疏本，不会仅冠以成玄英而不注郭象之名。

⑥相关著录及录文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3 页；郜同麟：《德藏吐鲁番道教文献叙录》，《西域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41 页。

⑦根据现有材料，暂无法判定其抄写年代，只能论其底本或祖本的形成年代。当然，二者也可能重合或相距不远。

其一,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文书以中唐之前为多,中唐以后则以民族语言文书为主,汉文文书不多。其二,从唐朝开始,经注本《庄子》已占据优势地位,如今敦煌遗书中《庄子》共20余号,除有白文本2号外,其余皆为经注本;北宋初期,由皇帝首肯、朝廷组织、著名学者参与校刻的国子监本《庄子》,亦是经注合刻,之后颁行天下,具有“官方定本”的权威性质^①。此本颁行后,诸宋刻本除了像吕惠卿、林希逸这样的注释本及静嘉堂本这一种经注疏本之外,其余皆为经注本、经注附释文本(说详下文)。在此背景下,若要组配成疏,自然是以“经注+疏”合编的形式,使用也最为方便,不太可能节略郭注而以经疏组配的方式重构。郭注整体篇幅不大,节略亦无必要。其三,成疏成书后并未如郭注那般被人视为经典,广为通行^②,吐鲁番又远在西域,亦无特予拼配的需要和必要,故该残片更可能是(或转抄自)早初的经疏合编本。综合来看,该残片很可能就是唐五代抄本或其传抄本。

从以上所论成疏作为一种集解新注本的性质及其他各种证据来看,成疏本早初即为经疏合编。这也相应衍生出一个问题:成疏有没有单疏本?有学者认为,直至宋代,成疏尚为单疏^③,其证据是《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景祐元年五月十五日,翰林学士承旨盛度等言:‘本院见阙《隋书》、应天图经、《道德经》并疏、《庄子疏》、《冲虚真经》并疏,乞下所属去处各给一部,付本院充公用。内《庄子》并《冲虚真经》疏如监本无,即乞于《道藏》内借本,付三馆差人抄写。’从之。”^④然前文已言,至迟在宋初已存在经疏合抄本。因此,仅根据题名并不能确定所言《庄子疏》为单疏。诸如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周礼注疏》题名为《周礼疏》^⑤,亦可说明仅靠题名不能证明文本的编纂形式。并且这里的《庄子疏》也不能百分百确定为成疏本,一如“《道德经》并疏”亦无明指。根据《新唐书·艺

①这项工作始于北宋景德二年(1005),毕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详参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1957年,第2231页;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2000年,第285页)。

②敦煌遗书中皆为经注本及白文本,未有成疏本,可见一斑。

③马鸿雁:《郭象〈庄子注〉版本研究》,第150页。

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六》,第2521页。

⑤详参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0页。

文志》《宋史·艺文志》所载^①,北宋有多种《道德经》义疏,其中一些重要疏本如唐玄宗疏、成玄英疏等早初即为经疏合编;《庄子》义疏在二史《艺文志》中也不止一种;至于《冲虚真经疏》,典籍似无载。即使“《道德经》并疏”所指为唐玄宗御疏,此书亦为经疏合编,同样无法类比推出《庄子疏》为单疏。故以此为据不足以确证成疏曾有单疏本流传^②。

二、组配与重构:经注疏合编本的形成

既然成疏原本不是经注疏合编,宋初又存在经疏合抄本和国子监经注本两种形态的《庄子》^③,宋人要合编一部经注疏本,最简便可行的就是“经注本+疏文”或“经疏本+注文”两种组配形式。前者因有“官方定本”性质的监本作底本,且可以直接附缀疏文,故可能性最大。后者虽然要在经疏之间插入注文,稍显不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宋代经疏本也是皇帝下令搜访,几经校正,编书入藏而来,具有一定权威性;也不排除宋人因考虑到经疏本的经、疏关系更紧密,甚至认为经疏本更接近成疏原本而以之为底本进行合编的可能。

沿着这个思路,首先考察宋初经疏本。如果它与成疏今本差距很小,则很可能就是经注疏合编本的底本(祖本);反之,则不是。根据陈景元校语^④,将张君房所校经疏本之文本还原,并与成疏今本相比较,具体结果见表1。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九,第1514—1518页。脱脱等:《宋史》卷二〇五,第5177—5180页。

^②要准确理解这则材料,还需注意:不能由盛度所言即推断国子监曾刊刻过《庄子疏》等书。宋代国子监刊刻多种典籍,盛度等人并不确定其中是否有《庄子疏》《冲虚真经疏》等书,故言若无刊刻,可以借取《道藏》抄印。至于《道德经》《冲虚真经》,则国子监有刻,“(咸平)六年四月,诏选官校勘《道德经》。命崇文院检讨直秘阁杜镐、秘阁校理戚纶、直史馆刘锴同校勘。其年六月毕,并《释文》一卷,送国子监刊板”(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第2231页);“(大中祥符)五年四月,崇文院上新印《列子冲虚至德真经》,诏赐亲王、辅臣各一本”(程俱撰,张富祥校证:《麟台故事校证》,第60页)。

^③白文本是《庄子》文本的一种重要形态,如敦煌写本、《道藏》中均存,故宋代可能还存在白文本,上述陈景元所见抄本中或有。

^④陈氏只录经文异文而不录疏文,故以下只有经文异文对照。

表1 宋初经疏本、成疏今本、监本异文对照

篇名	宋初经疏本	成疏今本 ^①	监本 ^②
《逍遥游》	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	八千岁为秋	八千岁为秋
《人间世》	其大蔽数千牛	其大蔽牛	其大蔽牛
《德充符》	□足以自反邪	不足以自反邪	不足以自反邪
《大宗师》	崔崔乎其不得已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崔乎其不得已乎
《山木》	从其令	从其俗	从其俗
《知北游》	谓无乎逃物	无乎逃物	无乎逃物
《徐无鬼》	察士无陵谗之辞	察士无凌谗之事	察士无凌谗之事
《外物》	中民之行进焉耳	中民之行进焉耳	中民之行进焉耳
《列御寇》	阖□尝视其良	阖胡尝视其良	阖胡尝视其良

从表1可以看出,宋初经疏本与成疏今本不同共9处,而成疏今本与以湖北本为代表的监本系统全同。因此,成疏今本并非以宋初经疏本重构而来,而应来源于监本系统,即以监本经注+疏文组配而成^③。

但这只是一种逻辑推测,仍需要证据来验证。故将成疏今本经文与监本系统的本子互相对照,如果二者十分相近,说明推测正确;如果存在较大差异,则推测有误。

现存宋刻本《庄子》^④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系统,一种多用《释文》所

①成疏今本质量最佳者乃《道藏》本,故此处以之为代表进行比较。

②监本系统中,质量最佳者为南宋高宗时湖北鄂州刻《南华真经注》十卷(以下简称“湖北本”),其刊刻年代在诸本中也属较早,故此处以湖北本为监本系统代表进行比较。下文凡涉及监本系统文本比较的均用此本,不另出注。

③敦煌写本和陈景元所录其他版本,或与监本、成疏本差异很大,不可能是成疏今本经文来源;或虽与监本十分相近,但不一定附郭注,不如用监本组配方便,情理上亦非成疏今本经文来源。

④除成疏本外,《庄子》现存宋刻本共9种:1. 南北宋合璧本《南华真经》十卷(卷一至六为南宋刻本,卷七至十为北宋刻本,故该本实为两种,姑从学界惯例算作一种),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7596);2. 南宋高宗时湖北鄂州刻本《南华真经注》十卷,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8350);3. 南宋蜀刻赵谏议宅本《南华真经注》十卷,现藏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索书号:121.333427);4. 南宋孝宗时江西刻本《南华真经注》五卷(卷一至五),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2148);5. 南宋末刊《分章标题南华真经注》十卷,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8351);6. 宋刻(转下页)

见古字,另一种改古字为今字^①。除此之外,两种系统差别极小,实质性异文很少^②,与敦煌写本、高山寺本所存大量异文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它们版本系统一致,当源于同一个祖本。北宋崇信道教,监本属于官方定本,由当时著名学者校勘,刊刻数年而成,质量优良,颁布后应会较快占据市场,挤压其他版本(尤其是写本)的生存空间,故而最终存留下来的本子,其底本(祖本)大概率为监本,即现存诸宋刻本的祖本很可能就是监本^③。因此,只需将成疏本经文与监本对比^④,即可验证上述推测。以《庚桑楚》为例,对比结果见表2^⑤:

表2 监本、成疏今本、《释文》《庚桑楚》篇经文异文对照

序号	监本	成疏今本 ^⑥	《释文》 ^⑦	说明
1	以北居畏垒之山	岷(足)	畏(岷)	通用
2	挈然仁者远之	絮然(道)	挈(契)然	形近讹字
3	畏垒大壤	大穰(道)	大壤(穰)	形近讹字

(接上页)元明递修本龚士嵩《纂图互注南华真经》十卷(多卷下部有残损),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A01576);7. 俄藏黑水城文献《南华真经注》残卷(存卷八、卷九,编号:TK97);8. 金翻北宋本吕惠卿《壬辰重改证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8352),该本又有黑水城出土的《吕观文进庄子义》残卷(编号:TK6);9. 林希逸《庄子虞斋口义》十卷,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7977)。

①详参刘涛:《现存宋金元版〈庄子〉系统考》,《诸子学刊》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7—159页。

②详参刘涛:《〈庄子〉异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方勇指导),2014年;蒋门马:《庄子汇校考订》,巴蜀书社,2019年。

③关于诸宋刻本同属监本系统的问题,笔者拟另文讨论,兹不赘述。

④因为监本是经注本,经注疏本拼配时自然是附带郭注,不会舍郭注而另择他本,故为行文简略,本文不另具篇幅比对监本与成疏本郭注。

⑤一些常见相混相通的字(偏旁)及个别极易辨识的形近讹误不统计入内,前者如苦若、今令、於于、己己、辩辨、修脩、彳彳、扌木、𠂇𠂇等,后者如臣巨、金全、天夫、生王等。若涉及语意歧解,则计入其中。另外,抄本句末常增减虚词,一般于文意无碍,本文亦不计入其中。表中“—”符表示无对应文字。

⑥为避免繁琐,表中仅列举成疏今本文字与监本有异者,并括注异文所出代表性版本的简称(道:《道藏》本;宫:宫内厅本;足:足利本;庆:庆应本;万:万治本)。

⑦本文将《释文》摘目词语作为参照列于表中,所用《释文》版本为《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宋元递修本。《释文》在摘目词语之外,还会罗列各本异文,今将其列于括号中。

续表

序号	监本	成疏今本	《释文》	说明
4	正得秋而 <u>万宝</u> 成	万实(宫)	万宝(万实)	宝(寶)、实(實)形近
5	<u>至人</u> 尸居环堵之室	至人(宫)	—	至、至形近,“至”为“圣”的俗字,“至人”“圣人”意义相类
6	不知所 <u>如往</u>	所以往之(足)	—	抄手习惯“所以”连言而讹
7	我其 <u>杓</u> 之人邪	标(足)	杓	郭注、成疏屡言“标杓”,受语境影响而讹
8	而 <u>况</u> 畏垒之民乎	况夫(足)	—	
9	举贤则民相 <u>轧</u>	轨(宫)	轧	形近讹字
10	子有 <u>杀</u> 父	弑(足)	有杀(弑)	常见同义字
11	越勉闻道 <u>达</u> 耳矣	未达(宫)	达耳矣	衍文
12	<u>子</u> 不知吾所谓乎	—(足)	—	夺文
13	<u>孰</u> 哉郁郁乎	熟(道)	—	古今字
14	<u>然而</u> 其中津津乎	然而中(道)/ 愁而夫中(宫)/ 然而夫中(万)	—	愁、然形近而讹
15	饮药以 <u>加</u> 病也	—(足)	—	夺文
16	<u>侗</u> 然而来	—(庆)	—	夺文
17	<u>宇</u> 泰定者	德宇(宫)	宇泰定	郭注、成疏皆作“德宇”
18	若 <u>是</u> 而万恶至者	有(道)	—	讹字
19	故出而 <u>不</u> 反	—(宫)	故出而不反	
20	是以分 <u>已</u>	也(足)	—	
21	<u>昭</u> 景也	昭也(足)	昭景也	
22	请尝言移是	常(道)	—	通假字
23	使人以 <u>为</u> 己节	—(万)	—	夺文
24	以用为 <u>知</u>	智(足)	为知	古今字
25	解心之 <u>缪</u>	缪(宫)	之缪(缪)	通假字

续表

序号	监本	成疏今本	《释文》	说明
26	贵富显严名利	藏(庆)	—	严(嚴)、藏形近而讹
27	知者接也知者谩也	—(万)	—	夺漏
28	而拙乎使人无己誉	—(足)	—	
29	圣人工乎天	于(宫)	—	常见同义字
30	夫工乎天	天全(庆)	—	衍文
31	而佷乎人者	佷(足)/ 佷乎(庆)	而佷	夺文;良、辰形近
32	是故非以其所好笼之	故(庆)	—	意义相同

从表 2 可以看出,成疏今本与以湖北本为代表的监本系统之间的异文,主要是讹夺衍倒等简单文字讹误(第 2、3、6、7、9、11、12、15、16、18、23、26、27、30、31 条)及常见古今字(第 13、24 条)、通假通用字(第 1、22、25 条)、同义字(第 10、29 条)、不区分意义的虚词(第 8、14、19—21、28、32 条)之别,并无多少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异文^①,且其中部分异文已为《释文》收录,如第 4 条,可知其来源甚早。古今字和通假通用字的异文,多是由于抄手、校刻者用字习惯不同,或对文本有特定认识,或弃古而从今,或弃今而复古导致。几组同义字,古籍中也常见互为异文。而抄本中增加、减少、改换虚词也很常见,一般不影响文意。所以成疏今本与监本实际差距很小。以其他篇目对校,所得结果也基本如此。故成疏今本是以监本(系统)为底本的推测应可成立。

此外,宫内厅本中郭、成二序之后有中书门下牒文曰:

中书门下牒 《庄子》并《释文》牒:

奉敕:庄周玄玄,理皈于冲宽^②;郭象为注,义造于精微。既广玄风,实资至治。朕仰崇古道,俯劝蒸民,言念此书,盛行于世,尚多踳驳,

①日本学者已有类似观点,如岛田翰认为“今校之(宫内厅本)于宋本,又无甚异同”,足利本“其编次与宋本同,分卷亦不异,而同异亦极相近,为从宋本所传钞无可疑矣”([日]岛田翰:《古文旧书考》,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 3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230—231 页)。但岛田氏一未说明诸宋刻本同属一源,二未做详细论证,故本文重新董理,加以论证。

②“冲宽”不通,当依顾炎武《求古录·宋颁于庄子牒》作“冲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83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96 页)。

已命校雠,将永焕于缣缃,宜特滋于雕镂。牒至准敕,故牒。

景德三年八月五日牒。

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

兵部侍郎、参政事冯

工部尚书、平章事王

该牒文是为国子监刊刻郭象《庄子注》(经注合编)而下。牒文当是宫内厅本(经注疏合编)之底本所有,而非抄手补加,亦可见该本来源于监本。

从成疏原本到早初经疏合抄本,再到经注疏合编本,成疏的文本形式不断变化^①。其间历经几百年,经文是否发生变化,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②。成疏本之经文虽已难知全貌,但通过逆推疏文,可得部分面貌^③,这种方法王叔岷已有运用^④。笔者曾正王氏之误,补其不及,以诸宋刻本、高山寺本(残存七篇^⑤)、湖北本、疏文四者相对照,结果显示,成疏今本经文与逆推疏文获得的原本经文存在较大差异^⑥。因高山寺本残存七篇只是《庄子》三十三篇的一小部分,若高山寺本是一个足本,以之为参照,相信逆推疏文所得经文异文会更多。而逆推疏文寻求经文原貌这种

①结合文献记载及上文所论,成疏形制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如从古字到今字的“当代化”倾向;卷数由自序中的三十卷到因组配经注(监本)而变为十卷,亦有少数从郭注本以三十三篇为卷者,如宫内厅本、万治本。

②因疏文无早期文本存留,故其历史流传与变化已很难推知,以下所说成疏原本的面貌主要指经文。

③逆推条目中难免有个别不当者,如疏文将经文一词释为另一词,导致由疏文逆推回去的经文文字并非原本。但如果有一定数量的逆推条目共同指向今本与原本不同,则今本与原本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仍能成立。样本数量越多,结论越可靠。

④王叔岷说:“今以《道藏》、覆宋二本比勘,出入颇多,互有优劣,已非成疏本之旧。欲窥成疏本之旧,斟酌二本外,尚当于疏文中求之。”(王叔岷:《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即成玄英疏本试证》,《诸子斲证》,第559页)按,类似做法清人早有实践,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屡就疏文用字推求经注旧文”(详参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331页)。

⑤残存七篇均属外篇:《庚桑楚》《外物》《寓言》《让王》《说剑》《渔父》《天下》。按,高山寺本与数种敦煌本异文高度重合,故其底本(祖本)形成时间不晚于唐五代(而敦煌卷子多数残缺过甚,故用高山寺本更为系统、方便)。唐五代距成疏形成未远,或可见二者之关系及成疏本部分原貌。

⑥详参谢明:《论高山寺〈庄子〉钞本的价值》,《敦煌学辑刊》2019年第4期,第118—128页。

方式本身也有局限性,只能推知经文的部分面貌,故成疏今本与原本之经文的差异还会更多。既然成疏今本属监本系统,则可知监本经文与成疏原本很可能存在较大差距。至于宋代所存张君房校经疏合编本,经文部分除了表1所列的异文之外,其余全同监本,而与逆推出来的经文同样存在较大差异,这说明此本距离成疏原本所依据的经文也较远。另外,成疏今本经文与疏文之间时有不相匹配之处^①,也可说明今本与原本之经文颇为不同。种种情况都指向成疏今本应为后人以别本(即北宋国子监本)经注匹配疏文而成。

结语

成玄英《庄子疏》的早初文本为经疏合抄,甚至成书时可能就是如此。将其与儒家经典义疏类比,从而推测它长期以单疏本形式流传的观点并无坚实证据。该书宋初虽有经疏合抄本,却不是今天所存众多经注疏合编本的底本来源。无论是经注疏合刻本,还是经注疏合抄本,成疏今本都是以北宋国子监所刻经注本组配疏文重构而来。逆推疏文所得的成疏本经文与成疏今本中的经文存在较大差异,且今本经文与疏文亦时有不相匹配处,这都说明从早初的经疏合抄本到后来的经注疏合编本,成疏本的经文因组配重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复原本之貌。

本文蒙《文献》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若干中肯建议,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谢明,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中国古典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①成疏今本疏文出字有与经文不同处,而《释文》与经文同。限于篇幅,兹举二例:1.《则阳》“子路曰:是稷稷何为者邪”,成疏:“总总,众聚也。”《释文》:“‘稷稷’音总,字亦作总。”2.《让王》“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成疏:“鲁侯,鲁哀公,或云,鲁定公也。”《释文》:“‘鲁君’一本作鲁侯。”(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887、962页)